

開卷有益



所謂「禪宗」或「南宗」的真史料——如神會的
文件等，——只有兩個大藏藏或者還保存了
一些原料：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敦煌。

當時我在日本續藏經裏已仔細檢查過，但深
了宗家，h, a, 了司中書的重要原料。所

以我

思

神會

此次

圖仁

胡適 說 禪

編 明立志 潘平

神會。我在法蘭
就費見了一卷

地檢最澄，圓行，
日錄，始知神會的

幾部大著作（《法苑珠林》）都早已在九世紀裏傳到
日本了。所以我可以說，我在三十三年前因
假設兩大大藏——日本與敦煌——裏可以尋得
神會和禪的原料，這個假設的兩個部分現在
都證實了。

胡 适 说 禅

HU SHI SHUO CHAN

编者/潘 平 明立志

责任编辑/黄金山

封面设计/刘 静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社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临沭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00,000

版次/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山东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500

ISBN 7-5060-0359-7/B·48 定价 5.80 元

序

这本书收编了胡适者论中国禅宗史的十几篇文章，名之曰《胡适说禅》。据说，现在中国的读者群中颇有一些人对宗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这本书就是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不很知道胡适其人，我想借此机会稍作介绍。

胡适本人不信任任何宗教。他生长于理学甚盛的徽州绩溪。以理学传家的士大夫多以“僧道无缘”相标榜。胡适自幼受此风气的影响，故不信鬼神，在12多岁时曾有打毁三门亭神像之举。后来到上海读书，接触西学，更热衷于追求科学真理。19岁渡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受杜威影响甚大，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曾自述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成了胡适一生做学问，谈政治，乃至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胡适已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被标为文

2018-5/11

学革命的急先锋。他所倡导的白话国语运动，几年的功夫竟然取得伟大的胜利。加上他与《新青年》同人们共同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他成为具有最广泛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常说他自己弄不清楚他的本行是什么。他在北大教过各种各样的课，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学史、英文学、中国通史……等等。但综观他一生的学问著述，基本上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思想史学家。胡适治禅宗史，就是为了撰写中国思想史的需要而起。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传入中国是很早的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西汉末或东汉初间。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大盛行。佛教号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有一套神学观念，有组织系统，有严格的教规，这对于一向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颇有其新颖处和迷人处。它不但得到上层贵族的信奉，也在广大的下层群众中受到空前的欢迎。因此，佛教的传播、演变，对中国社会是很有影响的。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国人影响最显著的有两方面：一是它的禅法，或者说心法；二是它的因明学或者说思维方法。禅法同中国古代儒家的内省功夫有相通之处。但它比中国人原有的心法要精微细密得多了。所以它能够征服中国的士大夫。在这方面，禅宗起的作用甚大。但禅宗在中国究竟怎样兴盛起来的？历史上可靠的记载甚少。佛教各宗派为了互争法统，往往伪造历史，要弄清其原有的历史面目，甚非易事。20年代初，胡适写作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他感到可疑之处甚多，无法下笔。乃不得不搁笔，下决心重新搜集材料，重建禅宗的历史。

1926年夏，为赴英国庚款谘询委员会的会议，胡适去欧洲，得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当年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从中国弄到的大批敦煌写经卷子，他从中查到

了禅宗大和尚神会的材料 20000 多字。此前，在国内所能见到的有关神会的材料仅只 600 余字。这下子材料增加 30 倍。于是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神会和尚，现在显示出他在禅宗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930 年，胡适把他搜集到的神会和尚的材料整理出版，名之曰《神会和尚遗集》。书中加写了一篇两万六千余字的长文《荷泽大师神会传》。这本书和这篇传记，是胡适研究禅宗史最主要的贡献。

胡适认为，神会和尚是佛教的革命家，是禅宗顿教一派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大功臣，也是使佛教高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人物。

胡适治禅宗史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同许多哲学家和佛学家不同，他的着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所以他是历史家或禅宗史家，而不是佛学家或禅学家。由于这种不同，他的某些见解往往不易被佛学家或禅学家们所接受。第二，由于胡适对神会语录的发现，连带地推动了国内外一些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对禅学古籍的发掘和研讨。从 20 年代末直到死前一年，胡适始终同日本治禅宗史的学者保持交往，虽然他们的见解不同，但对禅宗史、对禅学古籍的共同兴趣，使他们在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章。

这本书虽然不是胡适禅宗史论著的全部，但主要的东西基本都包括在内了。胡适的学术论著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明白晓畅。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能力，人人都可看得懂。当年学界有一部分人很看不起胡适，说他肤浅。对此，梁漱溟先生有一个说法，比较公允。他说，“胡适写的东西浅而明。浅，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浅而明就不容易了。”的确，哲学上的

问题，和一切神学上的问题，都很复杂，很精微，把它阐述明白了，使人人易懂，实在极为不易。大凡那些讲得艰深晦涩，读起来莫名其妙的文章，多半是作者自己未曾真正弄明白。所以，以艰深晦涩而自视高明的人，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当然，不是讲得明白，就一定讲得对，但至少表明作者有了理解。最可怕的是，把自己不曾理解的东西上天下地的胡扯开去。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大概将来还会有。

胡适著作的另一个可能不为人们很注意的特点，是往往借古人以浇自家胸中块垒。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吴稚晖。吴氏在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曾向胡适指出过这一点。我们细读他的《说儒》，他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应可体味到吴氏之说不是凿空之论。这一点，对做学问来说，应属忌讳。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思想感情丰富的人来说，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一种移情作用。作家的创作，学者的著作，都会把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注入到作品中去。纯粹理性的，纯粹思想的产品是很少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像梁任公，章太炎，陈寅恪等前辈大学者，人们都能从他们的文字里见出性灵，见出感情。而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理性，极力主张避免感情的参杂，却始终不能完全避免，足见理性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

编者编辑这本书，出版社印出这本书，大概主要不是引导很多人去研究禅宗史，而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借鉴：即不轻信没有证据的东西，要养成一种不为成见所蔽，不被宣传所欺，搜集事实，追求真理的态度和习惯。这一点对做学问的人尤其重要。在思想史上和宗教史上，为了争正统，争一尊，各家各派无不高张本派的大旗，拼命宣扬本派的学说，本派的历史，而把别家别派说成是异端邪说。他们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欺骗天下人耳目。如果没有一点怀疑的态度，没有不怕艰苦繁难去

搜求事实，弄清真相的勇气，很容易为某一家欺世之谈所迷惑，上当受骗。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们，能够从中得到这方面的教益和鼓励。

潘平同志编定此书后，向我索序。时下文债正多，琐事正繁，殊不易得暇晷，奈坚辞不获，草草写此，尚望潘君与读者见谅。

耿云志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录

序	耿云志 (1)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1)
论禅小札	(12)
论禅宗史的纲领	(12)
诗僧与谐诗	(16)
楞伽师资记序	(19)
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25)
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29)
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31)
《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31)
《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	(34)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36)
与入矢义高讨论早期禅宗史料	(38)
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史的纲领	(54)
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	(67)
菩提达摩考	(80)
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90)
禅学古史考	(94)

荷泽大师神会传.....	(109)
坛经考.....	(145)
中国禅学之发展.....	(166)
楞伽宗考.....	(201)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236)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248)
胡适禅学研究记事.....	(270)
编后记.....	(275)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那就是我对中古时期，我认为中国禅宗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与诠释〕。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一点来阐明我如何用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尝试和成就。

根据传统的说法，禅宗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次〔在灵山会上〕有位信徒向释迦牟尼献了一束花。释迦拈起一朵花〔但并未说话〕，各大弟子皆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有个弟子大迦叶（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释迦乃说，“达迦依（Kashima）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谓“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这个〔有名的“拈花微笑”的传统故事，〕据说便是禅宗的开始。这样便代代相传，一共传了二十八代。这第二十八代祖师便是菩提达摩（Bodhidarma）。相传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约在中国南朝齐梁之际〕到达中国。达摩莅华之后又〔在中国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谓“衣钵”一代传一代的传到“六祖慧能”。慧能为广东人，是个文盲，原来是位“忿獠”〔当时广东境内的一种半开化的少数民族〕。

慧能虽不识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游方到了北方，终于

被“五祖弘忍”所赏识，乃于某日午夜秘传以“衣钵”，乃成为“禅宗六祖”。[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说他在墙上写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那一段公案。]

自从这位不识字的和尚接得了衣钵，其后禅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门……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传统的说法。简言之，便是自释迦以后，禅宗在印度共传了二十八代；[达摩东来以后]在中国又传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国各门禅宗都是从“六祖”这一宗传下去的。这也就是一篇禅宗简史。

但是只把这一传统说法稍加考证，我立刻便发生了疑问。我不能相信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在1923年和1924年间，我开始撰写我自己的禅宗史初稿。愈写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时候，我下笔就非常犹豫。在此同时我却对一个名叫神会的和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根据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神会显然是把他那不识字的师傅抬举到名满天下的第一功臣。

慧能——如实有其人的话——显然也不过是仅仅知名一方的一位区域性的和尚，在当地传授一种简化佛教。他的影响也只限于当时广东北部韶州一带。他的教义北传实是神会一个人把他宣扬起来的。神会为他拼命，并冒着杀头的危险，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最后才把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义传入中原！

[由于史料有限]，我只是读了点有关神会的文献，便对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国所保存的资料和日本出版的东京版《大藏经》和《续藏经》（尤其是后者）搜查之后，我终于找出了有关神会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国和尚和佛教信徒们执笔的；许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对神会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兴趣。例如九世纪有一位叫做宗密的和尚，

他在谈到他当时的禅宗时，对神会便给以崇高的地位。据宗密的记载，那时禅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会和尚的〔“荷泽宗”〕便是当时的七宗之一。

但是这位不顾生死，为南方禅宗而奋斗，多少年遭迫害、受流放，终于经过安史之乱而获政府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点点纪录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没有丝毫著作传之后世。那时唐朝几乎为安禄山所颠覆，玄宗逃离长安往四川避难。途中自动逊位之后，太子即位〔灵武〕，重率诸将，以图匡复。

在这段戡乱战争的过程中，政府的财政却异常拮据，士兵无饷可发，政府只好筹款应付。筹款的方式之一便是发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为免役免税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纳款领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万钱。那简直是一种国家公债。政府为推销公债，因而借重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说会讲的老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推销。神会推销的成绩甚佳。据说这项筹款的成功，实为戡乱战事顺利进行的一大因素。

其后〔肃宗〕皇帝为酬庸神会助饷之劳，乃召请神会入宫，并于公元762年（肃宗宝应元年）在洛阳重修佛寺为其驻锡之所。是年神会便在该寺圆寂。享寿95岁。

〔上面的故事是根据宗密和尚的记载，和其他唐代遗留下来数种有关文献的纪录。〕根据唐代文献，宗密和尚在九世纪上半期颇为得势。〔所幸的是〕在唐武宗（公元841—846）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关唐代禅宗发展的史料。这些材料都是八九世纪中国禅宗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神会死后〔很多年，终于〕被追封为“禅宗七祖”。因此他

那位不识字的师傅，广东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间接被公认为正统的“禅宗六祖”了。

这段禅宗小史说明了神会的重要性。他确定了由南方禅宗来替代了自八世纪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禅宗！

北方禅宗的地位原是由两三位有力的和尚 [——“楞伽宗”里的 90 多岁的高僧神秀，和他的两位弟子普寂和义福] 所确立的。他们被唐朝中央政府尊崇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是指当时的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三帝”则是指“则天皇帝”（武后自称“皇帝”）和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这三位“皇帝”在宫廷之中对这些和尚大为尊崇。尤其是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神秀和尚于公元 700 年（武后久视元年）入宫，死于公元 706 年（中宗神龙二年）。在这些年中，北禅实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两个大弟子不但备受 [朝廷] 的尊崇，同时在民间也都被偶像化了。[唐德刚案：据说神秀于久视元年入宫时，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时候，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其哀荣的盛况，亦不下于 1200 多年之后胡老师在台北的出殡大典。]

神会和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莫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这就是佛教中的禅宗！

1926 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 [一部分] 中国对英国的庚子赔款 [作为培植留英学生之用]，因为该款用途尚未完全确定，我应约去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我因而想

乘此机会往伦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禅宗的资料，那些未经九世纪、十世纪，特别是十一世纪和尚们糟蹋过的史料。我想找出六七世纪，尤其是八世纪，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来的有关禅宗史的史料。

这些敦煌写本大致是第五世纪至十一世纪〔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时期〕的遗物，前后包括了 600 多年。这写本总共有 10000 卷以上，一直在甘肃敦煌一间石室之内被密封了〔将近 1000 年〕。

敦煌原有几座佛寺，多建筑于岩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内有一间〔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万卷以上五世纪以后的经卷写本，许多也至迟是十一世纪早期〔北宋初年〕的遗物。这一间被密封起来的石室，封外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那可能是战争期间，庙内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这个图书室封起，并画上壁画，使人不疑壁画之后还有藏经。

这千佛寺原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 1900 年前后已经是僧道杂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扫工作，无意发现这壁画之后似乎有门的迹象。他把这门打开了，便发现了这些经卷写本。这位道士既不识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这些卷子出售给附近乡民〔作为仙方〕以医治牙痛或头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购买这些仙方破片，烧成灰烬，加水吞食，冀图治病。他们这样对古物的摧毁已经有相当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这些“仙方”亦无从大量出售。他们这样的买卖一直到 1907 年〔始为学者们发现〕。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从印度进入中国，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听说这宗大量发现的中古写本，乃亲往查访。他向那位道士行了点约值七十两银子的小贿，便运走了七大车的卷子写本，经印度而去，终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翌年，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M. paul Pelliot）也闻讯往访，也就从敦煌运走了大约三四千卷。伯希和因为能读汉字，又懂一些中亚细亚一带的方言，所以他说服了这位道士，让他在千佛寺内住下，慢慢选择。所以他后来运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些卷子，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些只是重钞的佛经，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经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关道教儒教的写本；或是一些注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经钞本。他并且把汉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亚细亚方言等等写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实是一部选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纪录的钞卷。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国，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国学者来帮忙查对这些中文卷子。这样才惊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学术界人士才报告了政府，清廷中央政府乃立即通知甘肃地方政府，不再许外人窃取，并明令把全部卷帙运京保存。这一来全部敦煌经卷的古董价值乃举世皆知。因此在该项钞卷运京时，又被沿途偷窃。为应付点验起见，偷窃的人又往往把长卷剪成小卷来充数。由于监守自盗的结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后来敦煌卷子，除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北平图书馆”所收藏之外，还有千百卷被零售给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这便是这宗敦煌钞卷的一段沧桑史；也可算我个人自述的一个注脚。

长话短说，当我在1926年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话，我决定便访伦敦、巴黎两处的敦煌藏卷。看一看这一些唐代钞卷，对于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有没有新发展。我在伦敦看了100卷；在巴黎看了50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八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便是三卷未注明〔人名和年代的〕有关神会和和尚的史料，在伦敦我也找到一份〔类似的〕残卷。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所在，我对搜访这些史料是早有准备的。所以这些资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们照样复制，回国之后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们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发现了它们的后三年。我把这本书叫做《神会和和尚遗集》〔民国1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实在是对重治中国禅宗史的一个里程碑。

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20000字上下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三份钞卷，过去1200年都无人知晓。其一便是《神会和和尚语录》，此卷甚长；第二件是有原标题的叫《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是一份战斗文献，是神会对北派禅宗的道统真伪与教义是非的公开挑战。因为南北两派都自称是祖述达摩的正统。另一残卷则是显然也是上述战斗文献的一部分。〔唐德刚案：英文稿此处语义混杂不清。译文系参考《海外读书杂记》重校的。〕

这份战斗文献活生生的纪录了神会和和尚和一位名叫“崇远法师”的对话录。崇远法师是一位问难者，〔他向神会提出问题由神会加以解答〕就像现代电视上〔新闻节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这位崇远法师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这幕剧弄得更为戏剧化。

在这次问难中，崇远法师问曰：“〔北宗〕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何故如此苦相非斥？岂不与〔神会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讎？！”